

风云纪实

中日围棋风云纪实

刘刚 杨春平 梅绍华 编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中日围棋

风云纪实

刘 刚 杨春平 梅绍华 编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9 号

中日围棋风云纪实

刘 刚 杨春平 梅绍华 编著

* * *

责任编辑 赵 勤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密云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32 开本 8.25 印张 177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7.10 元

ISBN 7-5048-2453-4/G · 709

序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现代文化日趋繁荣的今天，发端于四五千年前的古老中华文明——围棋，不仅历久不衰，而且日见繁荣，并跻身于现代文明之列。它所蕴含的竞赛、科学、艺术、文化等的价值和魅力，已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围棋工作者，不能不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围棋的影响已遍及世界五大洲。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围棋赛事不断，各地区围棋水平不断提高。但以国别的综合水准来看，还是以东亚地区水平最高，当今世界棋坛已形成中、日、韩三足鼎

立的局势。

回顾整个围棋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近代围棋发展史，不能不令咱们中国人感慨万千。

我始终忘不了 1978 年我国围棋代表团访问欧洲的情景。

那一年在巴黎举行第二十二届欧洲围棋锦标赛。我们在那里所接触的欧洲围棋界的朋友，几乎完全不知道我国围棋水平的高低，甚至连我国是围棋的发源地都不了解。他们用的是日本的棋盘和棋子，看的是日本的棋书、棋刊，甚至连围棋的读音也是日语“碁”的音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围棋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日本。本世纪 20 年代，日本的一个四段棋手杀遍中国无敌手，这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

新中国成立后，在陈老总、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怀和鼓励下，中国围棋手开始了追赶日本围棋的艰难的奋斗历程。从 1961 年日本的一位普普通通的五段女棋手打败所有中国围棋

高手，到1965年10月25日，我首次战胜日本九段棋手岩田达明，再到1985年11月20日，聂卫平在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战胜日方主帅藤泽秀行，中国围棋接连跃上了几个台阶。

中日围棋交流史再一次证实了陈老总那句名言：“国运盛，棋运盛。”

这些年来，随着全国性的“围棋热”的出现，有关围棋的出版物已为数不少。但是，全面反映上千年来中日围棋交流情况的文艺作品，这还是第一部。三位青年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围棋发展独特视角，用纪实文学的形式，把围棋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并相互渗透影响，从而使围棋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性文化的过程描述下来，读来别有兴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们并不是简单地描述历史事实，而是运用富含哲理的笔触，透过围棋发展的历史表面，发掘出围棋深邃丰富的内涵和围棋文化的无穷魅力，读后颇能令人深思。这部作品的出版发行，对围棋界和文学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希望通过这本书

的出版，会使更多的人了解围棋的今天和过去，也希望今后能看到这方面有更多更好的力作问世。

陈祖康

目 录

序

第一部 “王国”没落	1
第二部 奋起直追	33
第三部 擂台大战	123
第四部 平分秋色	201
第五部 走向世界	213

第一部

“王国”没落

第一章

堪称棋类之王的围棋，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它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邃、博大和神秘。然而在近代乃至现代，就文化内在意义的弘扬演进而言，围棋在故土上故射出的光辉却逊色于它的第二故乡——日本。自己的文化在他人手中放出了异彩，倒并不是悲剧。重要的是要透过现象探寻文化深处的潜流。

围棋，古称弈，我国文献上最早、最可信的记载是《左传》中所说的：“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时间是公元前548年。关于围棋的起源说法很多，有人说，它产生于距今四

五千年的原始社会末期，是氏部落的首领尧、舜发明了它，用以教育不很聪明的儿子。有人说，围棋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一个大臣乌曹制造的赌博工具。也有人说，围棋产生于战国时代，是战国时那些擅长于“害诈争伪之道”的纵横家们创造的。持第四种说法的人则认为围棋是上古的算命工具。

日本的松井明夫先生通过对围棋在大和民族精神的培养所起作用的研究，又得出了一些“新看法”。他似乎理解不了为什么围棋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如此不尽人意，提出了有关围棋起源的奇谈。他在《围棋三百年史》的《发端》一篇中说：“围棋与象棋有它们的共同的祖先，就是中亚细亚的‘盘戏’。”尽管这种忽视历史事实的说法在围棋界和史学界并无市场，但松井明夫观点中流露出的情感，却不能不使围棋故土的人民却细细咀嚼围棋这一古老文化的真味。

公元57年（东汉建武中元二年），日本国派了一个使者来到当时统治中国的东汉王朝。日本使者到了东汉的京城洛阳后，自诩来自“日出之国”，称东汉为“日落之国”。要知道一向重视“比附”的东方文化是很忌讳把自己说成“日落”的。然而，刚刚统一四海、正踌躇满志的汉光武帝海涵了日本使者的狂妄无礼，他礼遇来使，并让他感受了中华文明的繁荣。才摆脱了原始社会不久的“日出之国”的使者，目睹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社会的盛景，傲慢自大之气一下子荡然无存。回国前，他毕恭毕敬地接受了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国王的“汉倭奴国王”印绶，而且还尽可能地带走了“日落之国”的大量书籍，这其中就有介绍“对弈”的。文明如同流水，从发达的高处流入落后的低处。

桑海沧田，几百年的时间如烟云流过。王朝的更换和变

迁，北方民族的入侵和融合，国家的分裂和割据……这一切没能阻止封建文化在中华大地发展，也没能阻止中日两国的交流。一批批来华的日本国使者，把一船船的书籍带回日本。“拿来主义”的单向文化输入，加速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华夏文明的种子在大和民族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特别是在这一时间跨度的尾声——南北朝时期，日本使者访华尤为频繁。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也是思想相对活跃的时期。当时，随着主流思想儒家经学的崩溃，思想界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对围棋的种种限制也有一定突破。围棋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繁荣期。尤其是南朝的宋、齐、梁三代，围棋异常兴盛。宋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这些颇有作为的君主都酷爱围棋，并积极倡导围棋。他们有的设置官署管理棋手和围棋活动，有的举行围棋等级赛，有的组织编辑棋谱。当时，在士大夫心目中，围棋的地位十分崇高，朝廷上下棋风如炽。围棋故土的这一特殊形象，对正大量地引进中华文化的日本影响很大。围棋在日本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7世纪初期，日本人“好棋博”的名声已远扬海外。《隋书·东夷传·倭奴》就有此类记载。当时的日本，从天皇到僧尼都喜欢下棋。来自中国、朝鲜以及日本本土的各种风格的棋盘，不仅是天皇宝藏库中的珍品，而且是天皇炫耀其权力和财富的物证。那时，法律是禁止僧尼们从事音乐和比武活动的，但却鼓励他（她）们下棋手谈。

到了唐朝，中华文化空前发达，已处于世界文化的顶峰。辉煌灿烂的唐文化如日中天，对唐疆域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尤其是对日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无数日本的仁人志士，为了追求先进的文明，涉险渡海来到中国，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摄

取中国文化。据日本史书记载，唐代日本共派 19 批被称为“遣唐使”的使者来中国，加上隋朝统治期间日本使者三次来访，隋唐期间日本共 22 次遣使来华。“遣唐使”的随员中，不仅有医师、画师、阴阳师等专门技术人员，也有一些日本知名的棋手。日本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之一——《万叶集》就记述过一位棋手随“遣唐使”在唐学习和研究中国棋艺的故事。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时期是大唐帝国的鼎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于此最为活跃。李隆基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皇帝，对围棋有特殊的兴趣。他不仅喜欢同杨贵妃等嫔妃和大臣对弈，而且也喜欢与外国使者对弈，借以炫耀“大国”的盛势。

公元 701 年左右，李隆基还没有登基。一天，他听说刚刚来长安的“遣唐使”的随员中有个叫辨正的僧人擅长围棋，便棋瘾大发。他在东宫礼节性地召见了“遣唐使”后，就匆匆提出要与辨正手谈一盘。一盘棋罢，两人成为朋友。在以后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辨正与李隆基多次对弈，切磋技艺。

如果说，李隆基与辨正的对局，还具有棋友手谈的意思，是非正式的比赛，那么在日本民间广为流传的吉备真备与唐朝国手玄东之战，则可说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第一次对抗赛。

吉备真备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在日本国民心中，他还是一位从事日中围棋交流的先驱。日本镰仓时期的画家吉备真备在中国的围棋活动绘制的《吉备大臣入唐图》，被视为日本国宝。

吉备真备在开元 5 年（公元 717 年），作为留学生随第九次遣唐使团来长安。这次遣唐使团共有 557 人，规模浩大。很多为中日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知名人士，也随这次遣唐使团来中国。如阿倍仲麻吕、僧玄昉等人。吉备真备是日本的围

棋国手，到长安不久，连续战胜了不少唐朝的好手，震动了长安棋坛。为了同吉备抗衡，唐玄宗李隆基特地在御前安排了一场比赛，由唐朝国手玄东迎接吉备的挑战。这盘棋双方都倾注了全力，盘上妙手联珠，精彩纷呈。开始时，玄东略占优势，但棋到中盘，形势逆转，吉备的一个小尖使玄东一块棋的眼位成了问题。经过长考，玄东依然找不到应对的手段，额头不由渗出汗来。玄东的妻子也是棋坛高手，她看出了丈夫的窘境，心里暗暗着急。这时，天渐渐地黑下来，趁宫女们进殿掌灯的当口，玄东夫人乘人不备把吉备真备的一个关键棋子从棋盘上拿走并咽下肚，从而救活了玄东的那块孤棋。吉备真备察觉到玄东夫人的小动作，但他假装不知，仍然认真地下着棋。这盘棋吉备虽然败北，但却换来了玄东的友谊。后来，吉备在其他事情上遇到麻烦，借玄东的帮助才化险为夷。当然，这段故事有很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很难看作信史。但多少说明唐朝时日本围棋水平已到达了能和中国棋手抗衡的地步。

中国史书中关于中日围棋棋手比赛的最早、最详细记载，见于唐代文人苏鹗著的《杜阳杂编》。

公元848年（唐宣宗李忱大中二年），日本王子渡海来到长安，朝见李忱。日本王子向李忱进献了大量的稀世珍宝。此外，他还从日本带来很多乐工，专门为李忱演奏日本音乐。李忱热情款待了来自远方的贵宾。他在官中大摆宴席，请日本王子遍尝中国的山珍海味。席间，他命宫中的乐工艺人给日本王子表演歌舞。日本王子是日本围棋界第一高手。他请求李忱答应他同唐朝高手对弈。李忱爽快地答应了日本王子的要求，当即召棋待诏顾师言进宫和日本王子对局。王子大喜，忙命随从取来楸玉制的棋盘和冷暖玉制的棋子。时值夏末，长

安城内暑气依然蒸人。李忱信手抓起一把晶莹的冷暖玉棋子，顿感一股清爽的凉气从手上传到心中。嘴里禁不住惊奇地“噓”了一声。日本王子连忙近前解释道：“殿下，在距离我们国家数万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集真岛的海岛。该岛上有座被称为凝霞台的山，这山的顶部平坦像一个大台子，台子的中央有一个水池，池水清澈无比，池底布满黑、白两色的玉子，白玉洁如皓月，黑玉色如宝砚。用这种玉石制成的棋子，握在手里，冬天会感到温暖，夏天则凉爽无比。所以人称“冷暖玉”。还有这楸玉盘，乍看像是珍贵的楸木制成的，用这种玉石雕琢的棋盘光洁可鉴。”正说着，顾师言已奉召而来。于是两个人就用这楸玉盘和冷暖玉子在大殿里摆开了“战场”。

顾师言何许人也？他似是当时大唐的第一国手。他的棋锋犀利，杀气十足，一般的棋手在他手下很难走过三十手。虽然他从没有同日本棋手下过棋，但骨子里他并没有把日本棋手放在眼里。这次奉召和日本王子对弈，他胸有成竹，胜券在握。前十几手，只见他落子如飞，表情坦然轻松。日本王子不敢怠慢，全神贯注，落子谨慎，往往每落一子都长考许久。二十手过后，顾师言审视棋局，发现自己不仅丝毫没占到便宜，反而在棋形上受到对方的限制，眉头不由地扭到一起，也开始长虑起来，不敢有丝毫怠慢。三十三手过后，形势仍不明朗，顾待诏手中的冷暖玉子却攥出汗来了，他本能地抬头看了一眼坐在龙榻上的李忱，李忱也看了看他，目光中流露出不懈。是啊，昔日即便是被称为“第二国手”的王待诏也不会让他顾师言感到如此棘手。顾师言不敢胡思乱想，连忙定了定神，又长考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忱因看累了，已悄悄退席。突然间，顾师言眼前一亮，他慢慢地伸

出手，把满是汗水的棋子敲在楸玉棋盘上，下出了被誉为“绝唱”的镇神头。“双征”，日本王子似乎已发现自己棋的缺陷，他紧抱双臂，圆睁双目，又考虑片刻，然后深深地向顾师言鞠了一躬推枰认输。事后他满腹狐疑地问负责接待工作的司礼官：“顾待诏是今朝第几手？”司礼官感得据实回答有失大国面子，扯谎道：“第三手。”日本王子请求和第一国手再战一次。司礼官哪里去找第一国手呢？于是敷衍道：“我国的规矩，只有胜了第三，才能和第二交锋，赢了第二，才能和第一交锋，您现在连第三都下不过，不能和第一和第二下。”日本王子信以为真，万分感慨地叹息道：“小国的第一，不如大国的第三，今天我才信服了！”

关于这次比赛的真实性问题，近代中日围棋史家多有质疑。日本历史文献也没有王子来唐的有关记录。但这个传说却也在日本流传着。“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这句话，刺伤了大和民族的自尊心。于是以后日本的《江谈抄·吉备入唐问事》、《阿倍仲麻吕入唐记》等著述中，出现了另外一些传说。传说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其主题都是博学多才的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如何借助鬼魂的帮助，机智地战胜了唐朝的国手，维持了日本民族的尊严。如且不谈上面所讲的各种故事是否真实，也不谈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感情是怎样通过围棋交流的故事表露出来的，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唐朝时中日两国围棋高手进行过正式比赛。结局是可以篡改的，但历史不能抹杀。

二

盛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对外再也没有

以前那样大的吸引力。这自然也会影响到中日围棋的交流。尽管从宋、辽、金、元、明、清的史料中基本上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但日本僧人虚冲与中国高手林应龙合著棋谱《适情录》一事，却不能不说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值得一书的佳话。

根据虚冲和林应龙合著的《适情录》，我们知道虚冲僧人是在1488年中国明代时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虚冲在中国时，利用修行读经的闲暇，经常与中国棋手手谈，切磋技艺。后来，他把他在日本时的对局和与中国棋手的对局整理成《决胜图》一书。这是一本具有比较文化意义的围棋书籍，影响很大。少年林应龙初读《决胜图》时，就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他评价这本书“妙语悟旨，犹仙方也，大家当自得之。”为了使《决胜图》内容更加丰富，更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以便广泛传播，他对这本书进行了改编，改编后的书叫作《玄通集》。约20年后，他再次整理包括《决胜图》在内的资料，最后著成《适情录》。《适情录》的诞生是中日围棋第一次合作的结晶。

可惜的是，中日围棋在此期间的交流有据可查的只有这一次。总的来说，唐后清初，中日围棋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各自沿着本国的社会、文化和民族精神所规定的路线独自发展。

在中国，缺乏外在竞争的围棋，受到了主流文化儒学的压迫。围棋在其发展的初期——春秋战国时就被势如朝阳般的儒家文化降格为低层次的文化。《论语·阳华第十七》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里，孔子把围棋仅仅放在比“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好一点的地位上。孟子说得更明白些。他说：“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文化昌

盛的负作用就是排斥异己。围棋虽算不上儒家文化的对立者，但它毕竟和“仁、义、礼”有些差距。到了宋、明、清，在儒家理学的重压下，围棋趋向完全的娱乐和游戏化。一方面，它变成了市井上的高雅的娱乐工具；另一方面，则成为一些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麻醉品。这样，就与道家“出世”哲学合上了拍。到了明、清，棋手们的生活来源几乎完全靠教棋、赌彩以及接受达官贵人的馈赠。其地位十分低贱。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奢望从中发掘出深奥的智慧？又有何人妄想凭借它弘扬民族的精神？然后，尽管如此，围棋的魅力仍深深地吸引着一些有志者去执著地钻研和追求。宋代的贾立，元代的严德甫、晏天章，明代的过百龄、刘伯温，清代的范西屏、施定庵等，都为中日围棋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大师，围棋才得以在艰难的困境中继续生存和发展。

与中国的情形相反，在此期间，围棋在日本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平安时代，围棋是贵族们不可或缺的教育，是官中高雅的娱乐。镰仓、室町时代，武士阶级原原本本地继承了棋盘上这种高雅的精神，在战斗和比武之余，他们用围棋训练嗜武好胜的武士道精神，陶冶坚忍不拔的情操。15世纪，德川幕府建立前后，日本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本因坊算砂，他改变了古老的座子制度（所谓“座子”，是指开局之初，黑白双方各在对星位先摆一子，类似现在的“对角星布局”），而开始采用自由落子制度，从第一着起便自由选择点，由此出理了布局和定式的天地，也为日本围棋的飞跃展开了翅膀。当时的幕府将军也十分重视围棋，特设了“棋所”，使棋手得以巩固作为幕府庇护下的专家的地位，接受了俸禄。后来这种俸禄又变成了世袭制。算砂去世后，嫡传制度建立了，